

以大爱文化为基础的社会资本培育和灾后重建问题研究

张克俊 张鸣鸣

〔摘要〕 作为新的资本形式，社会资本已逐渐成为经济发展的关键源动力之一。大爱文化的本质决定了其具有转化为社会资本的可能性，具有不可让渡性、互惠性、可再生性和辐射性、高重建成本等特性。汶川地震灾后救援和重建实践一再证明：大爱文化不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特别是在降低交易成本、推动区域合作和城乡统筹、优化政府公共职能和促进社会良性互动、升华公民意识等方面收益显著，使灾区大爱文化氛围浓厚，信用和合作理念深入人心，社会规范逐步形成，社会网络不断拓展，为社会资本培育奠定了良好基础。进一步对现有社会资源加以引导和利用，能够显著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推进灾区重建进程，因此，应采取措施引导和培育以大爱文化为基础的社会资本在未来发挥更大的作用。

〔关键词〕 大爱文化；社会资本培育；灾后重建

〔中图分类号〕 C912.6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4769 (2010) 02-0147-05

爆发于地震救援中的“大爱精神”在灾后重建中得以进一步凝聚和升华，这种建立在大灾之上的人际网络超越了传统的建立在血缘或地缘基础上的社会关系，能够使信任迅速在群体成员之间传递，降低经济社会的经营管理和监督成本。并且社会网络的密致增强了资源配置能力，使经济主体（如企业）能在整个社会中得到支持，降低了创业成本，有利于新的产业和企业的出现。更重要的是，对于一个群体来说，“大爱”是一种声誉，加大了对违约、失信等道德风险的抑制，反过来强化了集体精神的持续性。大爱文化既体现于作为个体衡量的以“人”为主体的微观层面，增加了个体摄取资源的机会；同时作为集体衡量的以“人类”为主体的中观或宏观层面上，

形成于群体共同愿景的大爱文化，有力地提升了群体的集体行动水平。然而值得重视的是，大爱文化和大爱精神在汶川地震的救援和重建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但这种自发的情感更多地来自于大灾之后人性的体现，而不是一种能够带来经济效益的社会资本，如果不加以重视和培育，系统性的缺乏会使其在灾后重建中慢慢淡化，对经济和社会的促进作用也将逐步降低。因此如何将大爱文化培育成对灾区乃至整个社会带来效益的社会资本，是当前值得重点研究的课题。

一、大爱文化的社会资本属性辨析

1. 社会资本理论回顾

从物质资本到技术资本再到人力资本，学者们不断延伸和拓展着经济增长的要素边界，使增

〔作者简介〕 张克俊，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张鸣鸣，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博士，四川 成都 610071。

长的“源泉”突破了物质实体的局限。随着市场的日趋成熟和资本的持续增长,同样的生产要素投入、同样的技术水平、同样的人力资本积累在不同地区的经济增长水平是不一致的,这有悖于罗默和卢卡斯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学者们注意到,组织或地区的文化作为经济社会的一份子,能够加强或削弱物质资本的配置效率和人力资本的协调效应,从而导致经济增长水平出现差异。那些可通过促进协调行动而提高社会效能的组织文化特征,比如信任、规范及网络进而形成了一种新的不依赖于物质实体的资本,被称为社会资本。^[1]与前面提到的三种资本形式相同的是,社会资本也是生产性的,能够产生经济效益。不同的是,社会资本无法在个体上独立发挥作用,它只能作用于至少两人之间的联系上,嵌入到社会网络中,从社会关系中有目的地获取资源。^[2]它包括社会结构的某些方面,而且有利于处于同一结构中的个人的某些行动。^[3]正如福山所强调的那样,社会资本是由社会或社会的一部分人普遍信任所产生的一种力量,这种社会资本的积累不是来自于理性投资,而是来自于宗教、传统、习俗等积累过程。^[4]

社会资本被越来越多地用于解释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问题,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管理学家等都不约而同地将社会资本作为研究的重要依据,因而衍生了不同视角下的社会资本概念。一个普遍的看法是,“资本”具有明确的产权特征,是可分割和可交易的,然而社会资本是一种特殊的资本形态,其产权归属和产权特性是非常模糊的,^[5]社会资本的涵义至今没有统一的认知,还未能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但一致的观点是,社会资本能够为其主体带来基于网络和观念的经济效益。

2. 大爱文化天然地具有社会资本属性

大,“天大,地大,人亦大”(《说文》),爱,“仁之发也,从心无声”(《康熙字典》)。“大”的“爱”蕴含着人类社会美德的无私和无疆,反映到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中,就形成了人类社会的精神财富——大爱文化。从社会发展、人类进步的视野观察,大爱文化具有以下显著属性:第一,不可让渡性。大爱文化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中,附着在特定的网络里,通过个人或组织行为所产生的有利于整个网络的精神财富,它有着特定的适用范围和发生对象,具有不可让渡性。第二,互惠性。从大爱文化的表现来看,它包括对他人的无私奉献,也包括信任、诚实、

声誉和规范等认知性因素,这些在个人、组织间相互联系的因素对内能够增强组织凝聚力以摄取资源,对外可以提升认知度以强化集体行动能力,能够使个人、特定群体以及整个社会共同获取收益。第三,可再生性和辐射性。作为一种精神财富,大爱文化能够在社会网络中通过个体的互惠行为不断充实内涵,并辐射到更宽的社会网络,促进受益面的扩大。第四,具有高重建成本特性。不同于物质生产,文化的形成和传播是历史的产物,是在社会关系对资源配置的不断调整过程中积累形成的,是实际或潜在的资源总和,其形成与打破都伴随着社会关系的认可或隔阂,制度和行为只能起到辅助形成的作用,却无法决定这一过程,因此它的破与立都必然伴随高昂的成本。

继承于中国古代道德传统精华的大爱文化在当前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被赋予了具有时代特征的新内涵,使其具有了从单纯的、附着并与其他形态物质共同发挥作用的精神财富转变为能够独立发挥资源配置作用的资本的基础。首先,具有社会主义特色的大爱文化是黏性的。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一致的大爱文化是黏附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的,与其他地区相比,具有这种文化的区域有竞争优势。其次,大爱文化具有经济价值。大爱文化通过信任、付出等实践活动所产生的正外部性,能够显著降低交易成本,提高资本的差别竞争力和价值总量。因此,具有经济特征的大爱文化具有明确的社会资本属性,具备了成为资本的基础。

二、灾后重建中大爱文化的经济和社会效应

1. 降低交易成本提升灾区资源配置效率

汶川地震后灾区陷入生产停顿、生活无落的困境,虽然政府提供空前规模的正式援助,但受各种条件限制,仍有无力顾及的方面,社会资本此时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补充正式制度不足的作用。例如灾后农房恢复重建时,农户采取换工方式解决人手不足问题,基于“熟人网络”的民间非正式借贷也在此时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微观层面的社会资本对灾后恢复的作用相当显著。更为突出的是,大爱文化在灾后对口援建中起到资源互惠从而提升配置效率的重要作用。例如福建省援建彭州以“福建速度”、“海西精神”为指导,协调福建现有资源,在援建中“输血”与“造血”并举,实现“双赢”。目前已有盼盼食品集团、七匹狼集团、安踏(中国)有限公司、鸿星尔克集团等企业拟联合组成股份公司,采取开发工业地产的方式,在彭州建设工业园区,重点

引进服装、鞋帽、纺织、食品等方面的企业，对福建来说，能为其产业升级“腾笼换鸟”提供空间，并帮助这些劳动密集型产业解决劳动力问题。

2. 加强区域交流和促进城乡统筹发展

“大爱”将灾区 and 外界紧密联系在一起，以此为基础的全国一盘棋的灾后重建计划将城乡统筹、区域协调发展融为一体。一方面通过物质输送，帮助受灾民众恢复生产生活，从政策到实践都更加倾向于将发达地区和城市资源往农村输送，例如浙江组织广元培训 1000 多名农民工匠，解决近 7000 人就业岗位。另一方面，来自于市场经济的先进理念和机制也源源不断被输送到灾区，观念的更新、思想的解放，是发展的原动力。比如“盘活”对口援建资金这个问题，无锡市对口援建现场指挥组帮助汉旺成立了一家商贸开发公司，把所有工程全部纳入公司，这样就有 8.5 亿元资产，每年至少可申请贷款五六千万元用来进行土地综合开发，土地一升值就会产生效益，政府有了钱，就可以发展更多的民生事业。

3. 强化政府公共职能和促进社会结构良性互动

我国正处于经济和社会的双重转型期，汶川地震给四川带来了巨大伤痛，造成了无可估量的损失，对各级政府的社会管理体制提出了严峻挑战。政府在灾后重建问题提出之时，就积极采取各种方式，出台多项措施，明确提出灾后重建应“统筹规划、精心组织，明确政策、加强保障，突出重点、分类指导”⁽⁶⁾，这一指导思想的核心在于以科学发展观强化政府的公共职能，在编制城乡规划、制定公共政策、建设公用设施上提出了具体要求，综合考虑城市综合承载能力、农村生态环境、城乡居民无差别生活保障的公共服务问题，得到灾区和援建省市各级政府的积极响应，为政府职能的完善迈出了重要一步。例如江苏省重点帮助绵竹优化以政府服务为主要内容的软环境建设，打破原有思维模式和管理模式，增强服务意识，提高服务能力和水平，营造良好的“亲商、安商、富商”氛围，在人才、信息、体制机制建设等多方面提供帮助。毫无疑问，大爱精神在促进社会良性互动方面功不可没。一方面，全社会关注灾区，社会各个阶层团结一致，各发所长，为灾区恢复生产生活倾注大量财力、人力、物力，不仅这一地区内部实现前所未有的良性互动，外界也大大加强了对这一地区特殊资源状况的了解，为东中西部之间搭起了一个畅通的交流平台。另一方面，灾区的重建不仅仅是恢

复，同等重要的是区域经济和社会的全面、稳定、持续发展，在灾区的救援和重建过程中，新的思想观念、劳动技能、信息等不断涌向龙门山脉的各个角落，推动整个地区的城市化、工业化和农村现代化进程。

4. 升华公民意识和民族精神

灾区地处龙门山脉，是四川最为偏僻、发展最为落后的地区之一，受自然条件和社会发展水平约束，这一区域较为封闭，百姓的公民意识较弱。大爱文化在灾后重建中给予社会各个阶层平等的公民参与机会，更积极的社会参与活动有助于人们获得更多的资源。⁽⁷⁾随着救灾和重建的钱物陆续发往灾区，民众对能否公平分配以及如何分配的关注日益上升。最基层的农民其实不乏最有智慧的创造。据新华社报道，在四川绵竹地震灾区，齐天镇双林村一组受灾群众想出了这样的分配救灾物资办法：89 人的村民小组，选出临时负责人和监督人，把救灾物品分成 9 堆，每 10 人一组，每组再选出一名代表出面抓阄，抓到哪堆就拿哪堆，每组领回救灾物品后再分配。不要嘲笑抓阄太土，其所体现的民主精神既先进又现代。可以说中华民族从来就不缺乏民族精神，赈灾中中华民族热爱生命的精神动力在爆发的同时向世人宣告，国家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极大地提升中华民族精神，灾后重建工程任务量大、工期紧、施工条件恶劣等更是体现了民族中的大爱精神。

5. 提升具有社会主义特色的企业文化品味

企业文化是企业的灵魂，是推动企业前进的精神动力，其核心是企业的精神和价值观，它是社会文化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和重要载体，在现代社会中，企业文化能够凝聚集体力量，激励职工意志，约束个人和群体行为，对社会产生辐射作用，因此建立适宜的企业文化是现代企业经营的重要目标。汶川地震后，很多企业在灾难的第一时间表现出的社会责任，企业的反应速度、全员的参与程度、企业的响应程度等都充分体现了大爱的人文关怀精神，灾后仅 2 天，企业向灾区捐款累计超过 14 亿元人民币。灾后重建是长期的、艰巨的任务，对企业来说更是一场漫长的考验，“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和企业理念更加凸显，大量企业利用自身专长和资源，不仅“输血”，还尽其可能进行“造血”。金融、地产、建材等各行业纷纷为灾后重建出谋划策，提供必要的帮助。在新形势下，大爱文化逐渐渗透到企业文化中，企业凝聚力、责任感和社会化程度都在不断

提升。

三、以大爱文化为基础的社会资本培育的可能性和必然性

建立在中国传统价值观基础上的大爱文化具有鲜明的社会资本属性。一方面大爱文化充分体现了集体主义精神,通过建立义务、信任和非文本规范,极大地扩展了社会资源,降低了行动的交易成本;另一方面从社会结构的角度出发,大爱文化能够通过代际传递使不同地位、不同角色的群体充分嵌入到同一个网络中,成为一种结构性的制度资产。灾后重建中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极为短缺,但已经初步形成的大爱文化提供了丰厚的社会资本土壤,培育以大爱文化为基础的社会资本能够显著提升效率,优化社会结构,推动重建进程,是可能的也是必然选择。

1. 文化基础

中国传统文化主张人性本善,“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凝聚了中华民族对“大爱”的阐释和期望。从宏观社会资本的视角看,传统中国社会的灾害救济一直不是纯粹的政府行为,存在于民间的各种类型的宗族、宗教及慈善组织都曾经在灾害中起到过减轻灾害影响,组织灾民自救重建的重要作用。^[8]新时代“以人为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为人人,人人为我”、诚信尚德、团结合作、创新、责任感和使命感等都是凝聚在新的文化中的社会价值观,在汶川地震的救援中得以凸显和提升,这构成了灾后重建中社会资本的核心。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集体主义价值观一直是我国文化洪流的支柱,这种建立在国和家基础上的情感文化其目的是实现集体利益最大化,在长期决定了以集体为主体的社会资本建立的必然性。

2. 信任与合作

古语有云“灾难无情人有情”,从微观角度出发,人与人之间的“情”体现在灾后重建上就是信任,信任能够帮助人们通过更有效的合作充分利用现有资源,进而提升重建的效率。就像一个同心圆,从最核心的家庭信任,到熟人信任,再到更抽象的一般性他人和社会信任,正常情况下,核心部分的信任比较容易建立,而越向外缘的普遍信任建立越困难。^[9]然而“大灾之中显大爱”,汶川地震的巨大灾难所带来的“人间大爱”使这个同心圆的半径不断延伸,这种突破了“熟人信任”范畴的“一般信任”,成为灾区经济社会重建的基础和保障。从更宏观的角度看,汶川地震后,对口援助使区域间的信任和合作达到一

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各个地区抛弃原有的成见、看法,都倾注了最大的努力来帮助建设新家园,这种信任和合作渗透在重建过程的每个环节。研究表明,信任和合作对技术网络和人力资本有显著正面影响^[10],在良好的合作氛围里,社会结构趋于良性,人才、物质和资金的互动更加频繁,技术和管理创新资源能够更加容易获得,市场交易的不确定性由于信息交流和知识共享而大大降低,因此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能够稳定提升。

3. 非正式的社会规范

大爱文化在灾后救援和重建中迅速铺开,成为获得广大民众认可的社会思潮,这种自愿接受的思潮很快变成了新的非正式的社会规范,人与人之间在处理问题时会更多地考虑他人的需求和想法。这种以大爱为基础的社会规范为社会资本培育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成为社会资本培育的核心内容和要素。这种规范并没有法律效力,但违反这一行事原则会受到舆论、道德甚至“熟人”的指责。

4. 社会网络

社会关系网络的资源量是由网络规模、紧密度、稳定度、异质度、层级和几何形状的复杂性等因素决定的,一般情况下,网络规模越大,紧密度、稳定度和异质度越高,层级越多,网络几何形状越复杂,则其资源量越大;反之,则越小。^[11]汶川地震以四川为中心,涉及甘肃、陕西、重庆等10省市,四川省21个市(州)就有19个市州不同程度受灾,重灾区面积超过10万平方公里,涉及6个市州、88个县市区、1204个乡镇、2792万人。震后来自全国和各个地方的救援和支持都凝聚在这一区域,以救灾和重建为核心的社会网络规模巨大,以政府为主体,各种非政府组织、个人构成了丰富了网络的层级性,加上大灾之后同心同结的紧密度和稳定度构成了一个极其庞大的资源空间,为灾后重建中社会资本培育提供了极佳的环境氛围。社会网络能够渗透到现代经济社会的每一个环节,包括技术创新、人才流动、产品资源共享、信息沟通等,有利于降低市场交易成本,提高资源配置效率,针对灾区各种物质资源稀缺的现实背景,以互惠为特征的社会网络建立有其必然性。

四、培育以大爱文化为基础的社会资本的政策创新和制度建设

1. 鼓励建立社区共同体组织

社区是解决社会问题的最基本途径,在经济

发展较为滞后的地区，社区内部的信任和互惠在动员群众、信息沟通、资源有效配置方面更能发挥作用。灾后重建任务重、工作量大，财力、物力、人力等严重短缺，社区立足本地资源，通过民间力量协调参与重建，能够有效降低正式资本援助的压力。应通过法律、财政等手段引导社区发挥大爱精神，帮助培育社区层面的社会资本。一是赋权于社区，为社区成员提供最基本的参与和决策权力，强调在规划、实施、管理、监督和检查等过程的受益主体的充分参与，最大限度地动员和组织受益群体参与活动的全程。二是通过各种方式给社区组织财政补贴，使社区组织能够将更多精力放在为社区服务方面。

2. 强化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中的社会资本培育

地震用新的方式重塑了集体的社会资本，“大爱”资本在学校得以确立并发扬光大，可以说学校是营建这种社会资本最有力的机构。应通过多种形式在学生中开展大爱思想教育，培育学生的民族精神和团队合作精神。首先，应通过课堂学习和讨论等形式使学生认识并理解社会资本的内涵及意义，在此基础上，鼓励学生发挥主观能动性，发挥特长，如以加入社会组织或成立组织等多种形式，积极参与灾后重建的各项工作，甚至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开展以发扬大爱精神为中心的评比活动，使学生们能够将社会责任与日常学习重叠在一起，形成有益于社会的科学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3. 建立社会资本交流平台

要承认和鼓励非政府组织（如慈善组织、志愿者团体等）的合法地位，并鼓励有益的社会组

织在更大范围和更丰富的层面上发挥作用，为建立和谐的公民社会奠定基础。同时应加强各类组织之间的联系和交流。作为最大的资源掌控者，政府要积极发挥其在资源配置、协调等方面的优势，加快公共设施建设，建立政府与非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与市场的网络化交流合作平台，以提高灾区重建的效率。

4. 以更加开放的态度强化区域合作与交流

应鼓励和引导区域软环境建设，加强政府的公共职能建设，增强服务意识，提高信息透明度、准确度和及时性，及时回应公众的关注，满足公众知情权。要坚决摒弃“部门利益至上”的狭隘心态，牢固树立“人人都是投资环境”的观念，增强大局意识。

5.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积极借鉴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的社会信用体系的经验，建立完善的征信数据的采集和使用系统，通过立法手段规范信息公开程度、信用评价等。另一方面应促进信用中介机构的建立与规范发展，从制度上保障信用中介机构能够客观、公正、独立地运营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在信用中介机构的管理方面，应加强金融、法院、工商等各部门机构的合作，以监督中介机构的行为规范。

6. 培育企业公民意识

应倡导企业责任感的社会文化氛围，对优秀企业给予税收、金融等政策优惠和品牌扶持，对不良企业进行监督和必要惩罚。同时应培育针对企业文化的培训中介组织，积极引导其在借鉴国外先进企业文化培训理念的同时，引入社会主义价值观培训。

【参考文献】

- [1] [美] 罗伯特·普特南. 使民主运转起来 [M]. 王列, 赖海榕译.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1.
- [2] Lin, N., *The Study of Human Communication*, Indianapolis: Bobbs Merrill, 1973; *Social Networks and Status Attainment*,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999, Vol. 25, pp. 467-487.
- [3] [美] 詹姆斯·科尔曼. 社会理论的基础: 上 [M]. 邓方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2.
- [4] Fukuyama, F., *Trust: The Social Virtues and the Creation of Prosperity*,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95.
- [5] 李孔岳. 社会资本的演化逻辑: 理论回顾、困境与展望 [J]. *经济学动态*, 2008, (10): 42-45.
- [6] 国务院关于支持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政策措施的意见, 国发〔2008〕21号 [Z]. 2008年6月.
- [7] [8] 赵延东. 社会资本与灾后恢复——一项自然灾害的社会学研究 [J]. *社会学研究*, 2007, (5): 164-185.
- [9] 韦伯. 儒教与道教 [M]. 王容芬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5.
- [10] 王霄, 胡军. 社会资本结构与中小企业创新——一项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实证研究 [J], *管理世界*, 2005, (7): 116-122.
- [11] 成良斌. 文化传统、社会资本与技术创新 [J]. *中国软科学*, 2006, (11).

(责任编辑: 何 频)